

江苏青年智库学者沙龙富民专场发言摘登

农民增收靠改革

祝保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在富民过程当中，农民是最重要的一个群体。按照常住人口统计，江苏还有4800万农村居民。农民收入的增长，除了依靠市场机制外，更重要的是靠改革获得一个收入增长的加速度。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来讲，2016年江苏城镇居民的人均纯收入是32070元，农民是17606元，收入比为2.28:1。在收入等级划分中，农民收入属于中低收入层次。从近两年我省农民的收入构成看，工资性收入已经接近50%，家庭经营性收入基本稳定在30%左右，转移性收入16%左右，财产性收入4%左右，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主渠道。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和劳动力素质提升，通过提高工资性收入是富民的主攻方向。但是面对当前国际国内宏观形势和江苏经济结构转型现状，工资性收入在短期较大幅度增长并不乐观。因此，要实现农民增收的加速度，必须靠改革的动力。靠改革增收，一要激发人的积极性，二要激发物的流动性，这是能够取得农民收入增长加速度的动力来源。目前，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农民增收有三项重点：

一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农业供给侧改革，主要是改变生产方式，加快一二三产

业融合。要鼓励大量的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充分利用“互联网+”手段和先进物资装备，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把农产品加工销售的效益留在农民手里。其次，实现绿色有机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当前农业供给已经基本不存在数量和品种问题，社会最关注的是绿色有机产品和质量安全。从生态的角度来讲，要减少农药化肥的使用，减少面源污染和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发展绿色有机农业，一方面可以确保质量安全，实现生态优先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第三，实现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从长期看，农业必须走规模化集约化道路。当前，种植业还是以小农生产为主，迫切需要扶持新型经营主体，完善农业经营体制。

二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在小岗村指出，“新形势下深化农村改革，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农村改革的关键点。农村土地主要包括耕地、建设用地和宅基地。针对这三块地，要继续深化“三权分置”改革，也就是坚持集体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推动土地有序流转。江苏的“三权分置”已经走在全国前列，

全省已经流转的土地超过3100万亩，流转率达到60%，占耕地面积的45%，土地流转促进了规模经营发展。江苏近年来积极扶持100亩到300亩的种粮主体，既符合经济和生态效应，也符合粮食安全目标。另外，推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上市。全国已经有33个试点区域，包括江苏常州的武进区。通过建设用地上市，可以使土地资源变成资产，放大流动性和财富效应。同时，一些地区还应该放宽对农民建房的限制，进一步放宽搞活农民的宅基地是增加农民财产收益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

三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江苏将全面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这项改革的目的是为了适应城镇化、市场化发展方向，明晰产权归属，完善各项权能，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建立

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集体经济运行新机制。改革的重点是把握好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经营性资产确权到户和股份合作制改革、规范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等关键环节。目前我省的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已经覆盖40%以上的村，今年还要进一步加大推进力度，让广大农民从改革中享受更多物质利益。

贯彻落实好中央和省关于农村改革的各项部署要求，是农村改革得以见成效的关键。江苏各级各部门各方面要同心同德，紧紧咬定富民目标，按照确权、赋能、搞活“三步走”的改革路径，下好农村改革“一盘棋”，让农村沉睡的资产“活”起来，让广大农民的口袋“鼓”起来。

(作者系江苏省农委副主任)

“富民”不能简单等同于增加收入

林闽钢

富民不能简单等同于增加收入，需要跳出收入看富民，从三个视角去统筹考虑。

第一点，要反思政府和市场的作用。浙江有温州模式，江苏有苏南模式。一直以来，两个地方总体上“打个平手”。为什么现在我们有一点点落后的感觉呢？我上个月去温州调研，温州的学者、官员们也在反思。他们认为，虽然温州老百姓的收入上去了，但是政府的基本公共物品供给落后了。举个例子，温州的道路、环境，跟我们苏州、南京相比还是有差距的。实际上，不管新温州模式，还是新苏南模

式，都在反思一个问题——政府和市场的作用。我们江苏是强政府，市场弱一点，所以，我们要补市场、补民企、补老板、补创业、补经营性收入、补财产性收入。浙江是市场强，他们就考虑提升政府作用，考虑怎么增加有效的公共服务、公共产品供给。在我看来，这两条道路没有好坏之分。我们要增强自信，找到我们江苏和浙江各自的特色和比较优势。

第二点，要反思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如何良性循环。目前，我国很多地方包括江苏，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却没能自动转化为社会

生活水平、社会生活质量、社会生活服务的提高，没能转变成老百姓的新期待、社会的获得感。所以，必须处理好经济发展跟民生改善的关系，实现良性循环、相互支撑。我认为，我们的研究应该聚焦怎么通往良性社会。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的“滴漏效应”、“涓滴效应”已经碰到“天花板”，经济要素、经济市场发挥的作用已经到了一个极致点的时候，我们要琢磨政府主导下的江苏富民道路怎么走。我认为有两个途径：一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一个好的社会应该是橄榄型的社会结构，中产阶级占多数。现在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是富民的重要对象，他们存在普遍的焦虑。全世界的中产阶级也都面临一个从中间向下“坠落”的现象和问题。所以，江苏应该重点研究如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二是缩小低收入群体。江苏的低收入不是绝对贫困，是相对贫困。相对贫困的规律跟绝对贫困的规律不一样。江苏应重点出台针对缩小低收入贫困群体的可操作办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缩小低收入群体，最后就实现了富民的核心——共享。没有共享的社会是不正

义的社会、不公平的社会。

第三点，要反思政府最应该做什么。去年我到日本大分县开会，发现日本经济相对比较落后的地区的乡村在饮用水、基础教育、公共卫生与基本医疗服务、公共信息、互联网、公共交通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和大城市的一样。之前去德国，看到德国很多城市的规模并不大，各个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也都是均等化的。我认为，江苏富民不能只讲提高收入，要紧扣发挥政府职能，突出做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比如，推动基础教育、公共卫生与基本医疗服务、公共文化等资源在更大空间扩散，在公共服务设施上，政府在规划环节就秉承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理念，着手均等化布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底线，守住这一底线，让每个人共同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资源和设施，就能享有共同发展的机会，这应当成为江苏富民的长远之策和施政重点。

(作者系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

“下乡资本”能否促进强富美高新农村建设?

杨光飞

目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推进时期，“资本下乡”已成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趋势。“资本下乡”有其特定内涵，主要是指在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引进城市的企业、资金“下乡”集中租赁农民的承包地，大规模种植经济作物或从事各种高投入、高附加值的“现代农业”。随着小农经济的式微，“资

本下乡”是一个必然而渐进的过程，这既是我国目前城市“反哺”农村的一项重要引导政策，也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的一个契机。

在上述意义上，“资本下乡”与“强富美高”新农村建设也存在契合的可能性：鼓励和引导城市工商资本“下乡”的初衷就是进一步

化解农村普遍存在的土地、劳动力以及资金困境。对于城乡协调发展而言，“下乡资本”在促进农民市民化的同时，也能进一步“反哺”农村获取资本收益；“资本下乡”政策如果真正落实，有利于实现规模经营、拓展产业链条和增加农业产值，也有利于人才、知识等要素从城市向农村扩散，从而促进“强富美高”目标的实现。但从实际调研来看，“下乡资本”并不必然促进“强富美高”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实现。

通过初步的调研分析，我们认为“下乡资本”脱嵌于“强富美高”新农村建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下乡的工商资本带来的“非粮化”、“非农化”现象。资本下乡经营农业导致的土地非农化使用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对粮食种植产生了一定影响。就目前的土地流转来看，一些下乡资本改变土地使用性质，转向经济作物种植，然后发展观光、旅游、度假产业等，最后远离农业，大面积、长时期的包地行为会给农业发展、农村稳定带来不利影响。

二是“下乡资本”带来的收益并没有和当地农民共享，甚至还带来一定的“挤出效应”。以土地流转为例。大多数出让土地的农民只是获得

一定的土地转让收入和一定的务工收入，没有获取稳定的收入增长点。目前，很多地方政府都是鼓励推动流转，将大面积流转和租赁作为政绩，甚至给予项目资金补贴，但这些项目资金、补贴基本不会流向农民手中。另外，“下乡资本”凭借自己的优势客观上排挤了一些散户和本地的一些种粮大户，也带来农民和农业、农村的疏离现象。

“下乡资本”的脱嵌现象和地方政府行为有着密切的关联。“资本”有逐利的动机，因而对于“下乡资本”需要一定的规范、引导和监管。而基层地方政府掌握充分的信息，应该基于农村、农民以及农业的利益对下乡企业的资格加以严格考察，也需要对下乡企业的行为进行规范、限制和追责，而不是迎合资本，甚至和资本“合谋”。为了更好提升“强富美高”新农村建设，需要引进那些对农村、农业、农民有一定情怀的社会企业家下乡投资，做长线农业，例如农业创新研发、培训新型职业农民，投资大型养殖场，等等。这样的资本带来的是一种带动效应而不是挤出效应、剥夺效应，也有利于促进“强富美高”的新农村建设。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现阶段江苏“富民”意涵的解读

马 岚

当前，江苏的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水平还不够相称，存在“双向差距”：横向比较，江苏比浙江人均GDP多了10000多元，人均可支配收入却少了6000多元；纵向比较，江苏省内区域、城乡之间差距较大。如何缩小这“两个差距”，成为江苏当前面临的紧要问题。

江苏当前所提的“富民”与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实际省情密切相关，因而也有其特殊内涵：江苏经济总量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社会财富的积累重在“富省”，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民众在社会财富分享中的地位，导致江苏的整体经济实力虽强但个人的财富却没有相应增长，因而“富

民”的实质是完成“富省优先”向“民富优先”的转变。基于江苏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以及省内的地域、城乡、群体差异造成的分化，现阶段提的“富民”是不同层次、不同水平、不同路径、能够满足不同群体需求的“富民”，贫困县的务农人员、苏北外出务工人员、苏南的小企业主、城市的下岗再就业人员、大学毕业生、海外留学归国人员“富”的要求和标准肯定有很大差异。

李强书记所强调的“富民”，是个“大富民”的概念，不仅仅是经济层面，还涵盖民生服务、社会治理、环境保护乃至文化建设等。无论是提高居民收入这种“可见财富”，还是公共服务这类“隐性财富”，归根到底都是要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首先，要充分就业，充分发挥就业在居民增收中的作用。对于大多数社会成员来说，就业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在于能够使就业者获得稳定的收入来源，而且还能够保证就业者平等地融入社会，参与各项社会事务，履行社会责任同时享受相应的权益。还应通过全民创业行动充分释放每一个创业主体的潜能，为全面实现富民目标积蓄更加强大的动力。

第二，要打造公正合理的社会经济环境，这是富民的必要条件。应当尽力消除来自户

籍、政治身份、地域等方面的歧视、排斥现象，尤其是应当消除政府“与民争利”的现象，保护社会成员的财产权，并扩大社会成员的财产性收入。

第三，一个社会能否为民众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产品同能否实现“藏富于民”有着直接关系。通过有效公共服务产品的提供，一方面可以减少民众的支出，另一方面可以增强民众抵御人生风险和持续积累财富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有效的公共服务产品也是民众的一种重要财富。基于江苏当前的GDP和财政收入水平，应该提供更丰富的公共产品和更优质的公共服务，让江苏人既感受到富裕的物质生活、良好的生态环境，又满足精神生活水平的提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第四，社会保障具有“安全网”的作用，它通过收入再分配，保证无收入、低收入以及遭受各种意外灾害的公民能够维持生存，保障劳动者在年老、失业、患病、工伤、生育时的基本生活不受影响，同时根据经济和社会状况，逐步增进公共福利水平，提高国民生活质量。因而，社会保障作为现代国家一项基本的社会经济制度，是经济发展的“推进器”，是维护百姓切身利益的“托底机制”，是维护社会安全的“稳定器”。（作者系省社科院副研究员）

苏北低收入农户增收的短板及建议

郇恒飞

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明确提出了“聚焦富民，让百姓过上更好生活”，顺应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低收入农户增收是富民工程的重点任务，也是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直接体现。

“十二五”末，全省277万低收入人口中，94%集中于苏北地区。破解制约苏北低收入农户增收的短板，是我省按期实现脱贫达标任务和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难点所在。

根据2016年苏北五市的低收入农户调查资料显示,其家庭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和困难分别是缺乏资金、家中有人患残疾或大病、缺乏劳动力、缺乏致富技术,分别占比44.5%、21.5%、18.2%和11.3%。这些数据,实质上凸显了低收入农户增收面临的“短板”:

“无路”——低收入农户受资本、劳力、技术多重制约,局限于种植水稻、露地蔬菜,大多只是满足自己生活需求,缺乏扩大生产、发展产业所需的资金,导致家庭增收困难。

“无力”——老弱病残比例高,自身发展能力弱。抽样调查显示,低收入农户中,体弱多病、长期生病及重大疾病的占到六成以上,另有10%左右为残疾。

“无招”——长期以来,我省对因残疾和因病造成劳动力缺乏的帮扶是有力的,但这部分人“造血”功能增强不快,自身发展能力得不到培养,缺乏独立发展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返贫率高。

“无智”——受教育程度低,择业领域狭窄。苏北低收入农户中,文盲率为21.9%,高于全省农村居民13.4个百分点;非文盲人口中又多为初中及小学文化水平,占到常住人口总数的70.6%,高中及以上文化水平仅占7.5%。

建议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

一是因地制宜,扶持特色产业发展。根据资源禀赋发展特色种植业、特色养殖业、观光旅游农业,不断探索发展特色产业增收脱贫的新路子。转变传统的农业生产经营理念,积极推广科技带动农业、一二三产融合的新型发展模式,拓宽低收入农户增收渠道。支持农民利用“互联

网+”等农业发展新理念、新模式,拓宽特色农产品的销售市场。

二是打造帮扶平台,促进农民转移就业。制定农民工职业免费技能培训规划,有组织地建设有效统一的培训体系,强化就业帮扶。积极设置农民工就业技能培训基地,提供多样化、实用化的培训。根据用工单位和农民工技能的需要设置和调整培训计划,实行“订单、定向”式培训,确保培训结业后能满足自身需要和直接输送到用工单位。

三是增强“造血”功能,提升农户自我发展能力。构建网格化帮扶体制,实现由依靠政府向政府主导、企业、高校、社会组织和民间力量群策群力转变。激活土地、劳动力、资产、自然生态等要素,激发低收入农民的主体意识和内生动力,实现从“输血”向“造血”的根本转变。引导各类企业、社会组织、爱心人士参与和支持扶贫开发工作,有效促进脱贫致富奔小康工程。

四是采取有效措施,注重社会保障托底。运用大数据平台,建立贫困人口健康档案。提高新农合门诊报销水平和比例,降低贫困人口大病费用个人实际支出。进一步发挥社会保障兜底线、救急难的功能,对无法依靠产业扶持和就业帮扶的低收入农户实行政策性保障兜底、纳入重特大急病救助范围,确保一个不少、一户不漏。加大临时救助力度,解决因老、病、残、灾致贫问题,编织兜住低收入农户基本生活的社会“安全网”。

(作者系盐城师范学院副研究员)

加快推进江苏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转型

张宏如

无论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还是加快城镇化建设,都需要解决农民工的就业转型。其中,占农民工总数一半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以下简称新民工)的就业转型尤需重视。根据江苏省统计局公布的全省农民工监测调查显示,2015年,全省农民工数量为1807万人,其中,新民工为900万左右。

江苏的新民工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就近就业人数比例高。新民工中选择家门口就业的人数超过外出就业的人数,占比分别为53.6%与46.4%,与全国的数据(60.8%、39.2%)有一定差异。二是就业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受文化程度低、职业技能水平差等因素的影响,江苏新民工就业大量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含量较低的行业以及传统服务业部门。三是月均收入有待提升。2016年,江苏新民工月均收入为3496元,虽然高于全国2016年3275元的月均收入以及东部地区务工3454元的月均收入,但离小康的标准仍有很大差距。

江苏新民工就业转型的重点和难点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优化心理资本,促进其由被动就业向主动创业转型。目前,江苏约40%的新民工想创业,但真正行动的只有15%。因此,要开发新民工个体心理资本,激发其创业内驱力。发展“互联网+”移动终端培训系统,开设专门培养新民工创业创新能力的网络课程。二是提升人力资本,促进其由劳动密集向技能密集转型。要通过高职院校、社会化技能培训机构等,帮助新

民工发现、建立和发展自己职业锚,帮助他们解决就业的瓶颈问题。要完善就业岗位与职业技能培训对接机制。搭建新民工就业与企业用工岗位供需对接平台,开展新民工订单式、定向式岗前培训,畅通人力资源有效供给渠道。三是建构社会资本,促进其由流动农民工向稳定新市民转型。要加快完善财政、土地、社保等配套政策,完善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加大对吸纳新民工较多地区的财政奖补和支持力度。

推动江苏新民工就业转型,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一是建立基于终身成长需求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借鉴德国经验,将新民工职业培训正式纳入江苏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包括“思想道德”“法律意识”“文化水平”“技术水平”“经营管理与产业开发能力”“主体意识与发展能力”六大方面的新民工就业素质体系。二是建立开放灵活的四层次供给动力机制体系。结合江苏实际,构建以教育机构为基础、企业主导服务、政府统筹服务、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四层次供给动力新机制。三是建立就业创业素质提升的服务支撑体系。加强对江苏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组织领导,实现城乡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统筹发展。建立“就业创业服务跟人走”制度,由输入地、输出地政府和省政府三方按相应比例共同承担,构建劳动力公共服务机制转换的保障体系。

(作者系常州大学商学院院长、教授)

当前江苏农民增收中面临的问题及政策建议

严斌剑

当前，江苏农民增收面临三大问题。

第一，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江苏农民收入增长面临重大挑战。在全国经济出现结构性过剩和市场环境压力下，农产品价格下跌阻碍农业经营性收入增长。同时，新常态下经济增速放缓，农民非农就业机会减少，对农民非农经营性和工资性收入都带来冲击。江苏农民增收也面临同样的挑战，不仅是构成其收入主体的工资性收入与经营性收入增长受阻，而且非农就业环境的恶化以及农产品价格的波动，新型经营主体的经营压力加大，还将挤压承包农户的土地流转收入以及农民从集体经营中获得的财产性收入。

第二，江苏农民增收速度下降，结构有待优化。构成江苏农民收入主体的经营性收入与工资性收入增速双双下降。在工资性收入和非农经营性收入方面，除直辖市外，江苏低于浙江，根本原因是江苏的民营经济发展水平、非农就业水平较浙江低。在转移性收入方面，经济新常态下江苏财政收入面临增长压力，农民转移性收入可能会增长乏力。

第三，江苏农民收入区域差异较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有缩小空间。江苏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苏南、苏中、苏北区域性差异明

显，且工资性收入是造成区域性差异的重要原因；同时，苏北作为江苏粮食主产区，其转移性收入较苏南、苏中更低。虽然，江苏农民收入增速高于城镇居民，但是，城乡收入差距的绝对值仍在扩大。

基于以上分析，结合江苏省的实际并借鉴国内先进经验，笔者认为，当前要确保江苏农民增收的势头，重点在于确保其工资性收入和非农经营性收入增长，难点在于拓展农业经营性收入，亮点在于提升其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为此，建议从四个方面采取措施：一是从推进农业提质增效着手，尊重农民的意愿和创造力，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以及产品结构，走优质化、品牌化、高附加价值道路，提高农业经营性收入。二是从优化农业支持政策指向着手，建立农业生态补偿机制，扩大农民收入补贴，提高农业风险补偿水平，增加农民转移性收入。三是从深化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着手，推动区域间集体经济均衡发展，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四是从创造良好的非农就业环境着手，促进农民创新创业，增加农民非农就业机会，促进农民非农经营和工资性收入增长。

(作者系南京理工大学副教授)

江苏扶贫开发与社会保障的衔接研究

刘米娜

2012年以来,江苏省通过大规模开发式精准扶贫工作基本消除了绝对贫困现象,但相对贫困状况却日益复杂。为此,江苏省制定了符合省情的《关于做好社会救助制度和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的实施意见》,通过低保兜底、医疗救助、临时救助、农村留守人员关爱扶贫等8项措施,确保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总体来看,江苏促进扶贫开发与社会保障有效衔接的政策成效明显,但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扶贫区域的社会保障压力大。农村社会保障整体水平受地方经济发展状况和财政因素影响大,在较为贫困的苏北地区,社会保障兜底与精准扶贫有效衔接的需求矛盾突出,财政压力大。二是社会保障对象甄别与精准扶贫对象识别过程不同步、标准不统一。目前,大部分地区的贫困人口统计工作由各部门分开统计,造成数据类别不完整,缺少交叉群体数据及贫困人口参与扶贫项目、脱贫退保的各阶段数据,贫困户易进难出或只进不出的情况屡屡发生。三是扶贫开发资金的使用效果有偏差。目前,扶贫资金多用于具有普惠性质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或者用作产业开发资金,而那些需要社会保障予以帮助的群体往往无法获得这些扶贫资金。四是社会保障政策设计不合理造成救助滞后问题。新农合及社会救助是以控制支出为政策设计的原则,大多

是事后救助,导致治疗与救助不能同步实施,有些贫困人群因垫付不起教育、医疗费用而被排斥在救助制度之外。五是制度缺陷滋长了部分贫困者“福利依赖”的思想。目前,因制度缺陷产生的贫困者寻租、“养懒汉”现象一定程度存在,这些“福利陷阱”不利于扶贫目标的最终实现。

扶贫开发和社会保障是江苏扶贫攻坚工作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可通过下列措施解决前述问题:一是加大资金投入,建立差别化的财政投入机制;二是完善识别机制,统一识别程序、过程与标准;三是创新帮扶方式,发挥扶贫项目与资金的保障功能;四是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发挥社会保障的兜底功能;五是采取社会保障渐退政策,激发贫困人口脱贫志气;六是重构精准考核指标,关注社会保障减贫能力。使扶贫开发与社会保障两项制度衔接保持常态化、制度化,建立一个农村社会保障与精准扶贫良性互动机制,形成可持续性、长效的政策合力,实现“低保保生存、救助防返贫、扶贫促发展、开发奔小康”的新格局,确保到2020年现行扶贫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并在全省范围内基本建立缓解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作者系南京理工大学副教授)

通过发展普惠金融和优化财政 转移支付促进居民增收

王翌秋

大力发展普惠金融体系，在促进居民就业、增加居民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方面有着重要作用。其一，通过金融产品创新解决融资难问题，有助于促进居民创业、增加收入。可借鉴深圳平安银行供应链金融的做法，使用动产质押或货权质押的方式进行授信。江苏水资源丰富，养殖业相对发达，可因地制宜开发养殖业抵押贷款、土地承包经营权贷款、“信贷+保险贷款”等贷款产品。鼓励创新型价格指数保险、天气指数保险等农业保险产品，确立农村居民社会化风险规避机制。建议加快探索银保互动，创新金融产品担保方式。其二，要加快推进信息化建设。当前，城乡之间、不同区域之间、不同家庭之间存在的“数字鸿沟”会加剧财富不平等趋势。要结合当前金融机构供给侧改革，通过信息通讯建设扩大金融服务受益面，特别是对弱势群体的覆盖，减小“数字鸿沟”的负面影响。可以在一些地区现有的无网点银行模式实践上，推广农村金融综合服务站，提供更多的银行功能服务。其三，人口结构变化的情况下应重视拓宽居民投资渠道。二胎政策实施后，由于来自于教育和未来不同性别子女在婚姻市场的压力，更多的家庭会增加房产需求，减少金融资产需求。要鼓励金融机构开发更多的适宜不同生命周期家庭的金融产

品，促进家庭投资渠道多元化，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

优化公共财政转移支付增加居民转移性收入，是实现居民增收的重要途径。在医疗保险方面，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是当前影响人口长期健康状况的首要因素，在对慢性病患者门诊费用实行按病种管理的基础上，引导农村基层卫生机构的偿付机制向慢性病预防和疾病规范管理倾斜，推动农村现有的慢性病治疗相关资源合理流向慢性病预防。继续保持新农合对农村居民的高覆盖率，继续稳步提高新农合的补偿水平和受益水平，完善农村重大疾病保障和大病保险工作。在养老保险方面，2014年7月后，新农保基础养老金每人每月70元，最低缴费标准为每年100元。按最低标准粗略计算，参保者60岁后每月大约仅能领取84元养老金，根本无法满足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建议大力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实现新农保公共政策“保基本”的目标，并稳步提高新农保缴费标准，调整并提高有差异化的缴费档次标准，特别是要提高最低缴费标准，引导老年人选择较高标准的缴费档次。增加对贫困老人的缴费补贴，缓解老年贫困问题。

(作者系南京农业大学副教授)

突破民生难点 构建可持续的富民体系

陈 雯

在当下以及未来一段时期贯彻落实“聚焦富民”战略，应超越经济收入和物质生活的单一指标，相应拓展至精神富足、文化信仰的多元范畴，构建从经济到文化、从物质到精神的综合性可持续民富民生发展体系。

首先，构建可持续的富民体系，需要重视、重塑家国关系，推动社会整体结构向拥有较大比例的中产阶层和中等收入群体的“橄榄型”稳定有序发展。而重塑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构建强大中产阶层，迫切需要保护并激励包括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PPP、社会组织、专业社会工作者和公益慈善四类主体的力量，弘扬全社会共建共治的现代理念。

其次，构建可持续的富民体系，应该在宏观战略上确立从稳定机制到活力机制，从底线机制到可持续机制的整体布局。在江苏发展实践中，一要提升收入的公平程度，打牢富民的稳定机制；二要提升就业质量，激活富民的活力机制；三要坚决遏制贫困的亚文化与代际传

递机制，筑稳富民的底线机制；四要重视教育公平和质量水平，探索富民的可持续长效机制。

再次，构建可持续的富民体系，应在评价体系构建包括物质层面客观测量指标和精神层面主观认知体验指标的双重标准体系。一方面，以收入、住房、消费等物质内容作为客观现实的测量指标体系，用于判断民富民生的发展层次；另一方面，以获得感、幸福感、满意度等心灵精神体验作为主观感受的评价体系，用于判断民富民生的内在变化、质量差异。

最后，构建可持续的富民体系，需要公共舆论和个人努力双重着力。民富民生需要良好的社会环境，必须善于利用信息时代的“双刃剑”效应，强化政府责任担当，避免政府负面形象泛滥，遏制社会“弱势心态”蔓延。民富民生的主观满意获得，也需要政府利用公共舆论和互联网的信息传播机制，引领形成倡导勤劳致富、自我提升和终生积累成长的社会心态。

(作者系江苏省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副教授)

江苏社科网和《江苏社联通讯》征稿启事

各市、县(区)社科联,各高校社科联(社科处、科研处),全省性社科类学会、研究会:

江苏社科网和《江苏社联通讯》分别是江苏省社科联的门户网站和工作内刊,是展示我省社科界学术研讨活动、交流各市县社科联和高校社科工作以及社科类学会动态的重要窗口。为了更好地服务“强富美高”新江苏和社科强省建设,充分发挥江苏社科网、《江苏社联通讯》的应有作用,保证社科信息的及时更新,现征集相关稿件,主要包括:

1. 社科工作动态。及时反映社科工作进展情况、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包括文字介绍和新闻图片。
2. 社科类学术研讨活动。包括重要学术研讨活动的新闻报道、图片以及主要学术观点综述等。

江苏社科网联系邮箱: js_skw@163.com

《江苏社联通讯》联系邮箱: jssltx@163.com

联系人: 白璐(高校) 025-83347162 18112990308

李慧(市县) 025-83325615 18112990316

夏丽娟(学会) 025-83370457 18112990315

江苏社科网编辑部 《江苏社联通讯》编辑部

“扬子江城市群建设” 智库论坛观点摘编

速度·密度·尺度和制度——城市群四要素
(沈迟:国家发改委城市与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规划院院长)

对城市群标准的界定,应该从城市之间的关联要素去考虑,主要有四个维度:速度、尺度、密度和制度。在速度方面,不仅是城市群内城市之间的距离,更主要是城市之间的通勤,如轨道交通密度、站点设置密度等都是重要因素。在密度方面,既包括城市群的密度,也包括人口密度、经济密度、就业密度和城市建设密度;在尺度方面,密度只有放在一定尺度空间内才有意义,在不同尺度上的密度、速度,决定了空间组织的效率,城市群必然是以“万平方公里”为尺度的;在制度方面,制度的隔阂有时候比空间上的距离更难以逾越或打破,决定速度、密度、尺度的制度因素主要有户籍管理、土地管理、规划管理、行政管理等。回顾我国城镇化历程,从改革开放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务工经商”到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包围城市”,从乡镇企业带动小城镇发展,到“城镇群”为主导,再到新一轮“特色小镇”热,从开发区的“一抓就灵”到新城新区两极分化,速度密度尺度的背后无不折射出制度的作用。城市群之所以成为“群”,跨越行政区的制度安排是关键,不仅需要看得见的纽带相联系,更需要看不见的一体化制度来保障。因此,扬子江城市群规划建设,要在科学准确把握密度、速度、尺度的基础上进行制度设计。

扬子江城市群空间规划提升与战略实施重点
(李程骅:《群众》杂志社副总编 胡小武:南京大学副教授)

“扬子江城市群”是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的“空间嵌套”,推动江苏沿江城市群发展、融合发展,须以实施南北节点城镇一体化为抓手,加强纵向贯通,实现跨江同城化,加快形成中上游的宁镇扬、常(常州)镇(扬中)泰(靖江、泰兴)、锡(无锡市区、江阴)泰(靖江、姜堰)三大跨江城市带和下游的苏(苏州、张家港、常熟、太仓)通(南通、如皋)特大型跨江城市带,逐步把长江发展成为“一江两岸”扬子江城市群的内河交通与空间中轴。与高铁重点提升远距离交通效率不同,轨道交通与物流为主的公路交通更加注重通勤化,是沿江城市群跨江同城化发展、中间县级行政区域加快发展的重要依托。因此,从中长期发展看,打造跨江城市带的关键在于加密扬子江城市群的跨江通道建设,由目前的15条增加到40条左右,全面提升县级行政区域的跨江交通配置水平,形成跨江公路大桥、高铁大桥、地铁隧道、公路隧道等多形态过江通道密集联通。为推动区域内高度一体化,建议对部分行政区划进行跨江调整,如合并江阴市与靖江市,成立江阴新区;合并扬中市、泰兴市和高港区,将句容市并入南京,成立句容区。

加快推进扬子江城市“群落”融合发展。
(成长春:南通大学党委书记、长江经济带研究

院院长)

借助生物学“群落”的概念,提出扬子江城市群融合发展目标,即通过全面提升城镇化质量,建设“紧凑型城市、开敞型都市圈、网络化城市群”,促进“融合发展”。首先,需要合理确定扬子江城市群成员构成,明确划定融合发展空间范围。建议扬子江城市群建设规划应形成“1(上海)+8(沿江八市)+1(盐城)”的总体架构;其次,要树立生态优先理念,建立绿色扬子江城市群。以国家“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战略为契机,以“生态优先、绿色引领、融合共生、绿色创新”为原则规划建设扬子江城市群;第三,优化扬子江城市群空间布局。以建成“主副双核,一带三圈”(上海主核,南京副核;沿江生态带、宁镇扬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和通泰盐都市圈)空间新格局为目标,促进相关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强化江北城市中心性建设;第四,强化南京在江苏沿江城市群发展、融合发展中的辐射带动作用。将南京作为扬子江城市群落的江苏城市“建群种”,充分发挥其作为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高原和高地作用;第五,推进城市之间的连绵发展。打通城市之间的村镇交通设施网络,着力重构城乡空间格局和村镇产业空间体系;第六,完善公共服务协调机制,打通城乡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资源共享和行业协会、资质与质量认证、人才流动等市场化资源配置机制的障碍。

关于扬子江城市群空间范围与定位的建议
(陈雯: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苏科创新战略研究院院长)

扬子江城市群作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先

行先发区域,是江苏新时期区域增长极扩容的核心载体。当前,苏南和苏中地区业已形成四个轴带或片区:一是串联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等中心城市而成的服务、创新经济发展中枢轴带;二是沿长江市县组成的临江临港经济发展轴带;三是沿宁杭走廊的西南部丘陵山区特色与生态经济片区;四是里下河(兴化-高邮-宝应)的农业及生态经济板块。在划定扬子江城市群空间范围时,虽然不将生态区和农业板块纳入有一定道理,但考虑到沿江八市及所辖县市(区)在自然地理与区位、交通网络联系、城市等级体系、产业协作分工、地域文化等方面均具有一定的整体性和相似性,建议将沿江八市全域作为扬子江城市群空间范围,尽量保障城市群内部区划完整性,避免空间“破碎”与行政分割。在此基础上,扬子江城市群内部需要进一步发挥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依托上海、南京等大都市为核心组织集聚空间,加快以跨江交通运输网络联系、滨江跨界城镇组团建设等推动跨江融合,优化沿江、沿沪宁、沿宁杭等城镇和产业发展带,加快形成分工合理、功能互补、整体联动的空间新格局,促进城市群一体化发展。

增强扬子江城市群建设的绿色协同(刘西忠:省社科联研究室主任)

在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不搞大开发、共抓大保护”的新形势下,实现跨区域绿色协同,是共建扬子江城市群的重中之重。在扬子江城市群内部及周边,推进沿江绿色生态廊道建设和淮河生态经济带建设,着力推进江淮生态大走廊、沿海生态保护带建设,推进宁杭生态经济带和苏南西南部绿色生态智慧谷建设及环湖生态圈建设,着力构建由

若干纵向、横向生态廊道形成的生态网络，与发展轴带、产业群链、城镇布局相辉映，在更大范围、更广空间塑造江苏绿色竞争优势，着力打造转型发展、绿色发展、引领发展的新江苏样本。

着力增强中心城市的带动引领作用（叶南容：南京市社科联主席）

在扬子江城市群建设中，南京是核心发展引擎和枢纽中心，应围绕提高城市首位度、打造中心城市下功夫：一是要加快推进宁镇扬一体化，以宁镇扬小三角为突破，强化南京的中心城市地位。二是大力发展总部经济、创新型经济、服务型经济和智能制造，提升南京的产业集聚能力。三是综合协调推进沿江城市融合联动发展。设立“枢纽经济发展专项资金”，建设枢纽经济区。推进长江航道、城际交通、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发展航运（空）枢纽经济、金融枢纽经济、信息枢纽经济。四是发挥南京科教资源丰富的优势，建立沿江八市科技创新合作协调机制，力争在公共平台使用、创新资源流动、成果认定、评估、基金的设立等方面实现政策一体化，减少各城市之间在科技创新等方面的壁垒性限制。

共用共享江海优势，建设上海的“北大门”、向北辐射的“中转站”（徐爱民：南通市社科联党组书记、副主席）

扬子江城市群可以共用南通江海联运与陆海统筹优势，共享收益。省级层面要针对扬子江城市群共同的战略产业链延展需求，尽快出台鼓励沿江向沿海转移的产业目录，推动共建大宗商品集散交易中心、江海联动国际物流中心；建设江苏长江流域航运公共信息平台，推动扬子江城市群跨境电子商务平台加快整合。推动设立扬子

江城市群规划协调委员会，以规划理念接轨上海，以城市群产业联动、载体联动、要素联动，促进与上海的空间融合，全力建设上海“北大门”。围绕建设重要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节点城市），以建成沪通长江大桥、建设上海多机场体系重要成员机场等为重点，加快完善综合运输通道建设，努力建成扬子江城市群向北辐射带动的“中转站”。

突破扬子江城市群两头“肥”、中间“瘦”格局，实现“中心开花”（倪郭明：泰州市社科联主席）

扬子江城市群是一个带状城市群，应坚持多核心带状扩散路径，以求整体提升。东部和西部分别以上海和南京为核心的城市群已经启动，东西两头南北传导功能比较强大，而中部城市泰州等处于沪宁之间的“断裂点”上，南北传导的功能较弱。江阴、靖江两市14年的实践证明，跨行政区的“软融合”缺少内在驱动力。为打破扬子江城市群“两头肥胖，中间瘦弱”的格局，实现“中心开花”、北岸崛起，建议省委省政府加大行政区划调整力度，加快过江通道建设，进行必要的资源整合，在泰州南进、常州和无锡北进上更多着力，形成跨江发展的城市组团，打造具备较强集聚辐射力的锡常泰都市圈。北岸三市既要接受南岸的辐射，还要承担南北传导的重任，可联合淮安、盐城等市，共同编制里下河湿地保护开发总体规划，彰显水乡生态特色。

将苏州沿江地区打造成国际化重要枢纽和开放口岸（刘伯高：苏州市社科联副主席）

受当前产业格局影响，苏州沿江地区城市化水平相对市域其他地区较低。将苏州沿江地区打造成国际化重要枢纽和开放口岸，是苏州在扬子

江城市群中首要且独特的定位。一要提升并发挥好苏州港港口功能。推动建设常熟、张家港、太仓与苏州市中心，以及省内主要城市的铁路网络，发展陆海联运。在内河建设扩展港口货源区域，形成内河和沿江港口联动。利用长江水道和跨江通道优势，发挥苏州港口对江北的辐射作用。二是依托对外贸易，建设全球化交易市场。将市场交易服务与仓储、运输、配送等活动相结合，形成全球化物资集散中心。加快建设信息网络平台，整合港口、海关、三检、交通、航运、航空、铁路、开发区、保税区等信息平台，实现全面的信息公用和资源共享。打通物流和商流中间环节，实现客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一体化。三是建设具有综合功能的港口型城市。以产城融合模式，提升旅游度假、商务、居住等发展空间，借鉴香港、新加坡经验，以港口为依托，建设具有综合功能的港口型城市，构建沿江现代化新城，打造扬子江城市群港产城联动的样本区。

推动锡常泰跨江融合发展，实现城市群发展能级整体提升(李伟刚：无锡市政府研究室副主任)

无锡地处长江三角洲地区和沪宁杭大都市圈的几何中心，是苏南沿江产业带和沪宁城市发展轴的中点，应强化“融入、结合、协同、共享”，加强与长江沿线城市合作，与常州、泰州共同努力把锡常泰板块打造成扬子江城市群建设的“支撑极”。规划融合上，启动编制锡常泰跨江融合发展规划；基础设施融合上，加强与常州、泰州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与跨江联动，共同推动盐泰锡常宜城际以及新长铁路等重点基础设施项目规划建设，开展城际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接驳体系研究；园区建设融合

上，重点深化“江阴—靖江”联动发展机制的改革试点研究，明确江阴—靖江园区、江阴高新区黄桥工业园区等后续发展的合作方式与功能定位；产业发展融合上，整合沿江地区港口码头资源，以锡常泰地区为经济腹地，共同打造长江经济带上特色产业集群。

差异化发展，实现“抱团、共享、互补”

(陈满林：原常州市社科联主席)

智能制造名城常州，应找准在扬子江城市群建设中的战略定位，锚定“特色发展、错位发展、梯度发展、集聚发展”的产业发展方向，谋求扬子江城市群协同发展的整体利益和共赢。加快构建与国际通行规则相适应的投资、贸易体制，全力提升城市群内主要城市的国际国内要素配置能力和效率。支持形成一批大型超一流的企业财团，鼓励企业在扬子江沿江城市群区域中进行跨地区的企业并购和重组活动，为企业的跨地区经营销售消除障碍，构筑扬子江沿江城市群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微观基础和平台。从统计税收金融等方面着手，建立合理利益调整补偿机制，整合高端要素，建设沿江产业链和创新高地。可探索组建“扬子江沿江城市群发展银行”，设立产业发展基金、农业发展基金、环境保护基金和社会发展基金等。

推进扬子江城市群生态文明合作(潘法强：镇江市社科联主席)

镇江是全国首批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省生态文明建设综合改革试点、国家低碳试点城市。在扬子江城市群建设中，应重点发挥其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优势。一是推动沿江产业带绿色发展。逐步形成以示范开发区为主、省级开发区为辅长江经济带产业协同发展格局。

“城市品牌与扬子江城市群建设” 学术沙龙综述

2017年5月7日，“城市品牌与扬子江城市群建设”学术沙龙在东南大学召开。本次学术沙龙由江苏省社科联主办，省城市经济学会、东南大学建筑学院、东南大学城乡规划与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承办。省社科联副主席徐之顺出席会议并作沙龙小结。省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东南大学建筑学院王兴平教授和学会常务副会长、江苏省委党校副教育长谈镇教授分别主持会议，来自省社科联、省委党校、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省城乡规划设计院、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南京工业大学、江苏师范大学、南京林业大学等单位4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本次学术沙龙聚焦“城市品牌与扬子江城市

群建设”这一主题，围绕扬子江城市群创新发展、江苏城市品牌建设、城市产业规划、产业园区规划以及房地产调控与实体经济复苏等方面进行了研讨交流。

李程骅教授认为，江苏的区域发展已经进入3.0时代，此时提出建设扬子江城市群这个概念适逢其时。扬子江城市群的建设不仅要在江苏的经济发展中起着脊梁作用，还要在国家长三角城市群战略中起到龙头作用。江苏接下来的经济发展一定要解决好跨江发展的难题，借鉴粤港澳大湾区和雄安新区的经验，依靠创新与改革来集聚人才和寻找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张伟院长认为，江苏最典型的特色景观资源

促进产业集聚集群发展，引导重大制造业项目向重点开发区域布局。二是推进优势产能合作。全面对接沿江城市建设发展需求，借助国家、省级各类投资合作和产能转移平台，引导鼓励船舶、化工、建材、光伏、轻工等优势行业开展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三是以中瑞生态产业建设为重点，加强与沿江城市在生态文明、低碳城市建设等方面交流合作，共同探索生态低碳城市管理路径。

突出文化和生态特色，打造融合发展样板区
(徐向明：扬州市社科联主席)

扬州处于沿江沿海“T”型开发战略空间的

交汇点，是长江流域的重要节点城市和传导区，应着眼“跨江联动”，打造融合发展样板区。一是主动对接宁镇扬一体化和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以重点跨界发展区域共建为突破口，主动对接南京江北新区建设。二是加快省级以上开发区和工业集中区与上海、苏南园区的板块式对接，明确共建园区的产业定位、功能布局，探索园区共建的新模式新机制。三是放开企业在不同区域内的流动，为推进共同市场建设提供制度和政策环境。在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应突出扬州文化和生态特色，加快构建大旅游格局，用好“大运河”“一带一路”等资源，高水平建设江淮生态大走廊。

就是水，江苏在未来一段时间应重点管控好12个省域重点特别风貌片，为在空间上将这12个重点特色风貌片区串联起来，江苏需将大运河、通榆河、沿海、沿江等特色廊道彰显出来。江苏可以先打造一批包含城乡风貌的魅力区，这些魅力区的规划范围必须要大过城乡边界。

胡小武副教授认为，城市品牌在城市经济发展竞争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于某些经济不是很强的优质城市，可以通过城市品牌的打造来不断地提升城市经济的能级，而对于体量较小的城市体，则要依靠构建特色。

徐海贤规划师认为，好的城市群应该是近距离、一体化、高密度的。以镇江为例，镇江要想在镇南一体化的背景下有所作为，就一定要在产业结构调整、功能提升、协同创新和彰显特色等方面下功夫，找准自身定位，进而塑造好镇江的城市品牌。

吴翔华所长就城市住房市场失灵程度作了发言，他认为垄断性是造成市场失灵的重要原因之一。江苏省内的南京、苏州等市的住房市场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市场失灵，而连云港、淮安、宿迁等市属于不失灵城市。他主张，在失灵较为严重的城市通过提高保障线和建立共有产权机制，对市场失灵进行纠偏。

欧向军教授就淮海城市群建设作了发言，他认为淮海城市群已取得了发展地位不断提升、城市群内部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经济集聚能力持续增强和区域中心度不断提升等四方面的成效，同时也存在着综合竞争力不强、内部发展不均衡、城镇化水平较低、产业结构层次不高、市场行政分割强劲和区域性中心城市设立强度不够大等方面的缺陷。他主张通过重大城市群综合设立、加快徐州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培育区域认同感和错位发展来探索淮海城市群建设新模式。

唐晓岚教授认为，现在很多城市已经没有了

自己的景观特色，大规模的城市建设破坏了原生景观。对于人文景观，唐教授认为有的可建，有的不可建，但对于一些有价值的历史遗产一定要保护好。为规划好城市景观，唐教授提出了6S循环体系。

学会会长、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所所长张鸿雁教授围绕如何坚守为人民谋福利的理念，守护中国城市的根与魂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强调，省城市经济学会将着力加强专委会建设、致力发挥学会智库作用，为江苏城市经济发展建言献策；学会常务副会长、省委党校谈镇教授，专委会顾问、南京大学崔功豪教授，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李德智副教授，扬州大学陆建飞教授、南京农业大学胡畔老师等围绕会议主题作了发言。

省社科联副主席徐之顺对学术沙龙进行小结。他指出：本次沙龙有三个特点：一是主题重要，内容丰富。沙龙聚焦城市品牌建设和扬子江城市群建设，契合当前江苏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二是精心准备，多角度多视野探讨。既深化了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又提出了富有启迪意义的观点建议；三是安排紧凑，形式活泼，富于创新，是我们学会互动的一个品牌。徐主席还结合个人的学术思考，提出城市研究要聚焦城市和城乡融合发展、城市创新、生态城市建设、城市精明治理以及城市现代化等问题，对城市研究紧贴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提出了要求。他要求学会用好、宣传好这次沙龙研讨的成果，放大成果的社会效应，更好发挥学会的咨政作用，加快由知识性学会向智库性学会转轨。

会上还举行了城市规划与经济发展专业委员会成立仪式，向学术顾问与专委会领导颁发了聘书。

（省品牌学会秘书处）

“华文文学与中华文化海外传播” 国际学术研讨会 暨新移民作家笔会综述

为促进世界华文文学进一步繁荣发展，深化国际学术交流，由江苏省社科联、江苏师范大学、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中国现代文学馆、江苏省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徐州市文联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华文文学与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新移民作家笔会于2017年4月20日至24日在江苏徐州举行。来自苏州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和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匈牙利、西班牙、日本等国家的新移民作家代表共70余人参加会议，围绕华文文学与中华文化的认同与传播、北美新移民文学的创作与研究、其他区域的华文文学研究等三个方面问题展开了富有建设性的研讨。

一、华文文学与中华文化的认同与传播

世界华文文学近年来蓬勃发展，中华文化的认同与传播是本次大会上专家们十分关注的问题。南昌大学陈公仲教授指出，新移民文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上世纪80-90年代，即新移民文学的初创期，多反映初出国门的兴奋及抗争、创业、进取的精神；二是新世纪头10年，即新移民文学的健康成长期，出现了严歌苓、张翎等成熟的作家；三是近10年来，题材

开拓、历史厚度和人性深度的开掘等都显示新移民文学进入了一个转折点。上海师范大学杨剑龙教授认为，近年来海外华文文学创作发生了重要变化，应对这些方面予以关注：一是在拓展国际视野中注重具有世界性意义作品的出现，二是在保持家园情怀中注重创作心态的自由与独立，三是在拓展大陆文学影响中拓展世界文坛的影响与价值。哈佛大学中国文化工作坊主持人张凤分别从聂华苓、叶嘉莹、孙康宜、沈宁、叶周等几位代表性作家入手，论析了北美华语作家的中华文化认同情况，她指出，当下华语作者写作格局发生转化，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是写作者的一致趋向，中华文化常被认为是作家的心灵故乡。中国文联出版社编审白舒荣认为，传播界、出版界、作家、海内外评论家、地方政府等各方面力量的共同努力促成了当下华文文学发展的繁荣局面。苏州大学曹惠民教授详细梳理了当代日本华人作家的写作，他指出，在一个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当今之世，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日本，都不需要“哈日”“仇日”，而更需要“知日”。江苏师范大学方艳教授摒弃了中日文化同源的观点，并探讨了中日文化的基因变异。此外，华中师范大学江少川教授、武汉大学赵小琪教授、济南大学宋晓

英教授、吉林大学白杨教授、中国社科院刘大先研究员也分别就各自的研究领域发表了观点，提出了不少具有创新性的学术见解。

在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过程中，华文文学是一座桥梁，也是一个使者，专家学者们对相关作家作品进行了评论。复旦大学陆士清教授评述了施玮的情爱长篇小说，提出了从榜样引导到价值引导的观点。中国海洋大学温奉桥教授评述了黄鹤峰的长篇小说《西雅图酋长的谏语》，深入发掘了华语小说书写的可能或限度，发出了让华文文学真正进入学科范畴的呼吁。华南师范大学凌逾教授介绍了“中文网络小说第一人”少君的微脸网络叙事，她认为少君形成了有别于一般网络文学的独特创作风格，既有文学叙事的丰富，也有网络形式化的新奇。南京师范大学王文胜教授评述了陈谦的新作《虎妹孟加拉》，她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赴美留学热、移民热，其背后有一个“美国神话”的支撑，这部作品就是陈谦对中国人心中“美国神话”的一次回望。盐城师范学院王玉琴教授以郑南川的魁北克系列小说为例，寻绎具有移民背景的“新加拿大人文学”之内涵，探讨海外华人文化认同中的中华文化与移民文化碰撞、分裂、交融等此消彼长的历程，呈现移民作家海外文学书写的精神视阈。

二、北美新移民文学的创作与研究

美国华文文学作家和加拿大华文文学作家从不同的角度，对北美新移民文学的创作、研究与传播问题阐发了自己的见解。美华作家、国际新移民作家笔会会长陈瑞琳站在历史的角度，梳理了新移民文学发展中的重大历史事件。美华作家、前美国《彼岸》杂志社副总编王威聚焦“新

移民华文文学的海归现象”，认为近年来海外华文文学呈蓬勃发展之势，主要体现在创作群体壮大、创作水准提升、创作主题多样化拓展、作品通过多种平台和载体传播、创作和市场的海归登陆等几个方面。美华作家、华人基督教文学艺术家协会主席施玮谈到了新移民文学的可能与路径，认为新移民文学应加强对独立思想视角的关注，作家要有预知已产生的精神潜流的能力，强调以新移民视野看中国历史、写中国故事，并呼吁学者型作家的诞生。美华作家、纽约美华文学艺术之友联谊会会长周励畅谈了自己之于徐州的故乡情结，从国人记忆谈到家族记忆，并就怎样促进中国与海外文化交流展开论述。美华作家、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荣誉会长叶周提到，在全球化的今天，要准确把握中华文化的精髓，具备开放的心态，成为称职的多元文化的传播者。加华作家张巽根重点探析了新移民文学的理论建构问题，从逻辑起点追根溯源，透视了中华文化对新移民文学的影响深度。

三、其他区域的华文文学研究

厦门大学朱双一教授借用梁实秋引入台湾的白璧德“人生三境界”（自然的境界、人性的境界、宗教的境界），解析了台湾作家李乔的小说《情天无恨——白蛇新传》。江苏师范大学王艳芳教授从族群叙事下的政治争拗、革命叙事下的自我塑造、身体叙事中的性别政治三方面，探讨了现有的谢雪红书写塑造的三种不同形象，并在后殖民理论视野下考察了不同书写背后的权力关系。常熟理工学院计红芳教授把白先勇同时作为文学创作主体和行动主体进行整体考察，论述了从20世纪下半叶至今，白先勇对汉语新文学的

第二期“扬州智库论坛”综述

2017年6月30日，由扬州市委研究室、市政府研究室、市委党校、市社科联（院）、扬州大学苏中发展研究院、扬州职大旅游学院联合主办，苏中发展研究院轮值承办的第二期“扬州智库论坛”在扬州举行。扬州市委常委、秘书长陈锴竑，扬州大学副校长黄建焯出席论坛。扬州市各有关单位、高校、社科学会、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70人参加了会议。论坛以“聚焦富民”为主题，共入选优秀论文11篇。

会上，省委研究室副主任仲红岩围绕省委十三届二次全会精神作主旨演讲，市委副书记、农工办主任李春国等5位专家学者分别围绕扶贫

开发、提升就业质量、农民增收、残疾人就业、大学生村官带动创业富民等专题展开深入研讨，扬州大学社科处处长秦兴方教授对论坛发言进行了点评。

扬州市委副秘书长、农工办主任李春国作主题为《扬州市农村精准扶贫的实践与思考》的发言。他指出，随着脱贫攻坚不断深入，我市扶贫工作已经到了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必须聚焦致贫根源、聚焦重点区域、聚焦特困人群，精准落实“六大保障”。一是健康保障。强化医疗保障与社会救助政策衔接，建立健全因病致贫、返贫防范机制。二是教育保障。对低收入农户子女实

贡献并不局限于文学本体的意义上，还可以扩大到文学批评、文学杂志、戏曲改编、电影编剧等多向度领域。马华作家戴小华梳理了四十年来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与中国的文化友好交流活动，她认为不同文化需要交流，只有交流才有融汇，才有发展。江苏省社科院刘红林研究员受马来西亚儿童文学协会成立的启发，思考了华文教育的新起点。澳华作家庄伟杰围绕中国经验如何找到自己的表达方式这一问题，对比了海外华文文学与本土中国文学书写的差异性，他认为，整体的汉语文学要想获得

更大的世界性意义，要先深入思考如何想象中国进而表达中国经验的根本问题。

在会议闭幕式上，复旦大学陆士清教授作了简短的总结发言，他指出，通过此次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形成了三点共识：一是增强了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二是意识到在World范围内传播中华文化这一责任和时代担当；三是坚信在前辈们传承奉献的精神激励下，华文文学创作和研究必将具有光明的前景。

（江苏师范大学郭如如 整理）

施教育再补助政策,除目前国家、省市已实行的生活补助和助学金、免学杂费政策外,在校剩余费用全部由政策兜底保障。三是住房保障。用好用足中央、省危房改造政策,加大地方财政投入力度,逐户研究落实改造方案。四是就业保障。因户因人制宜落实就业帮扶措施,帮助就近就便安排就业岗位。五是生活保障。建议提高低保标准,减免费用。六是集体保障。进一步提高村级集体经营性收入,增强村集体服务和保障低收入农户脱贫能力。

扬州大学经济学专业主任、教授成新华围绕“加快经济转型,提升就业质量,增加居民收入”展开发言。他指出,扬州产能过剩行业中的潜在冗余员工普遍存在教育水平低下的现象,一定程度上的技术性失业窘境不可避免。因此,要强化外来资本对本地原有企业的带动作用。要提升项目的技术含量和竞争力,加快自主创新,强化产学研合作,提升产业的竞争力,特别是引导企业面向国家战略。

扬州市统计局农调队农经处副处长丁超作《基于收入结构视角的扬州农民增收问题研究》的演讲。他表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在农业,难点在农村,关键在农民。要鼓励农民创业,除了意识培养之外,关键是要解决创业资金难题,扩大有效担保物的范围;探索采用合作社牵头多户联保,取得银行授信的模式;繁荣农村金融市场,降低农民创业融资的门槛。要破除技术支撑瓶颈,建立农民创业技术指导专家信息数据库,搭建农民与专家交流的网络平台;建立农

民创业园、实践基地。

扬州市委党校办公室主任、讲师高扬作题为“推进残疾人就业增收的扬州经验”的发言。她指出,残疾人作为特殊困难群体,整体经济收入、生活品质低于社会平均水平,成为富民增收工作中的难中之难。残疾人的特殊性决定了提升残疾人就业能力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其中教育康复是获得就业能力的基础,职业康复是获得就业机会的前提。在残疾人就业实践中,要践行“教育为基、培训为本、灵活就业为主”的工作理念,最大程度地提升残疾人的就业能力,为残疾人提供适合的岗位,实现体面劳动。

扬州大学高教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研究生鲁焯围绕“进一步发挥大学生村官在创业富民中的引领带动作用”展开发言。他认为,加大对大学生村官创业项目的引导和扶持,要制定农村涉农服务业项目落地的优惠政策;开展创业项目的“前置性”评估,减少同质化项目建设带来的资源浪费和发展风险;提高创业项目“准入”门槛,采取动态的“奖、补、转、停”发展性评价机制,实现创业项目的优化、整合和分流。

最后,扬州大学人文社科处处长秦兴方教授作总结发言,他提出,讨论“富民”这一话题更应该关注其时代特点和扬州特点,应注重思考“富民”中的“民”指的是何种“民”;“富”的内涵是什么,要从不同的角度对“富”进行解读;以及怎样实现“富”,政府和社会组织如何更有效地发挥作用等问题与思考。

(扬州市社科联)